

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差别化解读和本质性发展*

王今朝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性质以及它不适当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范式的原因, 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素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改造。我们试图通过这个过程展示一个更一般的问题, 即借鉴西方理论会遇到怎样的问题, 以及怎样解决。

关键词: 发展模式; 二元经济; 刘易斯拐点;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刘易斯 (Lewis, 1954) (下称刘文) 曾受到诸多批评, 而 Ranis (2004) 认为, 刘文对于分析今天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依然具有合理性。国内一些学者近年来用刘易斯和刘易斯式 (Lewisian) 概念、思维来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发展阶段 (李天祥、朱晶, 2012)。然而, 如果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交叉科学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地理学和法学 (Lewis, 1955; Lipton, 1970; Toye, 1980), 实际上也涉及到哲学、历史学等, 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刘易斯理论的适用性。特别是, 刘易斯作为一个生于西方、长于西方的人, 尽管具有相对西方许多其他学者较好的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 尽管在政治倾向性上属于社会民主派, 主张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 (Andrew S Downes, 2004), 但一个科学史、思想史或科学哲学训练有素的人或有极强实践经验的人依然有理由怀疑刘易斯理论的科学性。如果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所产生的根本怀疑具有科学的合理性, 那么, 对刘易斯的理论报有一种质疑的态度正是科学的态度所要求。

中国经济学博士生培养至今缺乏广泛阅读文献的训练, 西方博士生虽然阅读训练极多, 却不免自身在阅读时已经带有各色理论指导 (包括意识形态影响)。这两个事实让我们推测, 对刘易斯理论的差别化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本质性发展依然存在空间。仔细阅读刘文让我们发现了大量支持上述怀疑和这一推测的证据。这些证据既与耶鲁大学教授 Ranis (2004) 等的赞扬具有重大差别, 也与诺贝尔奖得主 Shultz 等的批评有很大不同。这表明, 这些证据即便对于世界最著名的往往被视为权威的经济学家都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考虑到美国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考虑到中国今天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复杂局面, 似乎花费力气报告这些足以对刘易斯理论给出差别化解读的证据是值得的, 而对它的本质性发展或许能够对多个领域的学者引起某种兴趣。

本文正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刘文的可取之处, 第二部分分析刘文存在的问题, 对这二者的讨论都是有别于目前已有的讨论的。第三部分是对刘文理论的本质性发展。然后是本文结论。

一、刘易斯 (1954) 之瑾瑜

刘文围绕具有无限劳动供给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用非常简单框架 (全文只有引言、封闭经济、开放经济和要点归纳四个部分), 对工资与利润分配、分配与资本积累, 以及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条理清晰的百科全书式的论述。无论是提出新概念还是讨论旧概念, 它在经济思想史的文献、当代经济学领域的专著以及经济史的事实中旁征博引, 表现出极强的分析能力。它提出的无限劳动供给概念是用新古典的术语表达古典经济学考虑的问题, 这给它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增色不少。否则, 可能也会如孔子所说, 言而无文, 行而不远了。从逻辑学的角度看, 这表现出刘易斯具有极高的抽象思维能力。在高超的抽象、分析思维能力驾驭之下, 在对经济史、思想史和多学科知识素养的滋润之下, 整篇文章显得既气势磅礴, 又严丝合缝。这样的文章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多见的, 无怪乎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第一, 正文伊始, 刘文就指出, 具有水平劳动供给曲线的经济既不是用于指发达国家, 也不用于指非

* 该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号: 11YJAZH089)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项目号: 12BJL009) 的支持。

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短缺男性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这表明，它不会同意 Friedman（1953）所提出的假设不重要的主张。不仅如此，它还表明，刘易斯极为重视假设的合理性和理论的适用性问题。这种谨慎治学的态度极为可贵，值得学习。刘易斯没有说明，刘文是否适用于中国。但按照刘文高度重视假设的这一做法，即使刘易斯认为刘文适用于中国，中国学者在运用刘文或其他理论和概念分析中国问题时，都必须进行合理性论证。不进行合理性论证，简单套用别人的理论是缺乏逻辑性的，也是后果惨痛的。刘易斯的这种谨慎治学的态度无疑对他担任官方重要职务具有极大好处。

第二，在明确研究对象和理论适用范围之后，刘文就着手建立无限供给劳动力概念的合理性。尽管刘文不同意马克思的关于经济发展导致失业的观点，但它正是用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比如，它正是基于农民、打零工者、小商贩、佣人、妇女、新生人口、失业者行为与绩效的实证抽象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概念。从经济地位共性来说，这些人群之间的其他差别可以被忽略，被抽象，他们可以被视为属于同一阶级。刘文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提出的这种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考虑到经济关系，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不过，刘文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格地区分开来，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来作为生产力的一个代表，而用工资与利润的比例关系代表生产关系。从本质上看，在这点上，刘文与马克思的分析没有什么差别。刘文还叙述了英国不同城市的妇女在劳动参与率上的不同，以此再次证明，经济发展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劳动供给是具有无限弹性的。

第三，上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属于非熟练劳动力，既然刘文要把他们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熟练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刘文认为，熟练工人的缺乏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它借用马歇尔准地租的概念，称他们的缺乏是经济发展的“准瓶颈”，意思是短期内构成瓶颈，长期内则不构成。这样，刘文不仅事先堵住了一种日后可能被那些未曾深思的人攻击的可能性，而且与后来关于人力资本的这一观点是一致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是在工作中得到的（瑟罗，1992，第55页）。考虑到与刘易斯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刘文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刘文这一观点尤为重要。刘文这里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①在否定“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基础上，刘文得出结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乃是资本和自然资源。应该说，刘文用瓶颈来描述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把资本与自然资源并列是比较准确的，这表明，刘易斯不属于早期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原教旨主义者。资本原教旨主义完全否定其他变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刘文表述的准确性带来了刘易斯的理论的科学性。

这里，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刘易斯本人还是一个产业经济学家。他所谓的资本主义部门当然是工业部门。所以，刘易斯的知识框架和研究兴趣都是与工业化主张相一致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点，不仅为中国和苏联的实践所采用，而且得到了张培刚、罗森斯坦-罗丹等学者的赞同。反观舒尔茨的工作，他试图在传统农业中寻找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与梁漱溟试图通过农村建设来发展中国的思想如出一辙。当然，也应指出，舒尔茨所考察的印度农业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农民从工作中得到的，而主要不是从正规教育中得到的。在这些比较之中，可以看出，最终刘易斯依靠观点的正确性胜出！

第四，接着上面对模型的叙述，刘文看似好整以暇地穿插了刘易斯对重要经济学概念的独特理解。比如，刘文厘清了当时许多新古典学者对于古典经济学家非生产性劳动的指责。刘文实际上精确定义了非生产性劳动，用它来指生产率较低的劳动，而不是指不带来效用的劳动。然而，刘文的这一穿插并非闲笔，刘文的这一定义实际上为古典学者把商业等领域的一般活动看成是非生产性劳动提供了一种解释。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控制商业部门，不能让商业等服务性部门坐大，形成控制实体生产部门的局面。考虑到后来金融部门的发展、世界发达国家形成服务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局面，或许，刘易斯的这个定义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中国在实际生产部门基础还远未打牢，就片面注重发展服务业、金融业，刘易斯的这个定义的现实意义或许更大。如果一个学者的论述关涉世界随后发展的重大格局，那其他人怎么不佩服他，所佩服的又岂止是识见而已！而且，刘文的主张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把资源

^① 用任何计量经济学方法所衡量出的一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只能是该国在某个阶段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下的贡献，并不具有普世的意义。中国学界今天似乎有一种过分相信人力资本的倾向，在实践中又把正规教育与人力资本等同起来。

从非生产性部门转移到生产性部门”。这是一个接近于用资源配置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思想，而且这一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资源配置的含义又与新古典在良好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含义不同，也与古典学派注重资本积累的理论性质不同。如果一个学者的论述提出了关涉世界重大实践问题的科学观点，那其他人怎么不佩服他，所佩服的又岂止是识见而已！

第五，刘文把资本所支配的生产看成是最有生产性的，因此，它又不得不论述资本的性质。1) 刘文清晰地指出资本与技术的不可分性，当技术停滞时，储蓄不会那么容易地转变为生产性资本。新技术的应用要求新资本，不管这种资本是劳动节约型的，还是资本节约型的。这种叙述就防止了他人指责它把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混入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之中。刘文强调，对于该文目的而言，没有必要区分技术知识和资本。2) 刘文指出了金字塔、教堂的耐用消费品性质，这实际上指出了封建社会中的储蓄转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储蓄转化的根本区别——生产性不同。3) 刘文还延续剑桥学派关于资本衡量与产品种类、要素投入、价格之间关系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资本效应的衡量是不确定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达到均衡，因而不可能用一个指标来衡量。

第六，刘文论证了信贷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①1) 在无限劳动供给的经济中，公路、桥梁、灌溉沟渠、建筑可以只需要最简单的资本再加上足够的人手就可以制造。这意味着流通资本而不是固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在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信贷动员资源从而促进资本形成，进而促进经济增长。2) 信贷作用虽然能够与利润使用达到同样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效果，但信贷的使用将导致物价上升，从而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新的资本形成会导致新的产出，供给增加后，物价就会回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不会形成持续的通胀（假设工资等基本品价格稳定）。3) 如果国家的信贷供给控制不力，就会形成信贷扩张与信贷收缩的周期以及相应的经济周期。4) 刘文指出，苏联由于信贷政策的使用，在 10 年中，价格上涨了 7 倍。

当讨论了信贷以后，很自然地就涉及到通货膨胀。根据自身理论体系，刘文认为，通货膨胀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观点恐怕与今天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以 0 通胀为目标存在内在联系。^②如果刘文关于通货膨胀的观点稍微引申一下，即刘文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被某些人理解为经济发展离不开通货膨胀，那世界长期的通货膨胀史就可以得到主观方面的第一步解释。当然，不能仅从刘文的上述观点就认为刘易斯赞同通货膨胀。因为刘文还指出，在资产阶级不成熟而且缺少规模的国家中，通货膨胀政策只能导致商品、土地和外汇投机。原因是，商人得到贷款后会主要用于投机，中产阶级用于购买美国汽车、旅游或投机外汇，而农民本来应该用它来改善农场，但可能用它来偿还债务，购买土地。只有成熟的工业资本家才能有效地使用贷款，因为他们的兴趣在于得到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好的工厂，能够克服通货膨胀的诱惑。因此，贷款的有效性取决于这个阶级有多大，而且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归于这个阶级。刘文还指出，通货膨胀在许多国家会破坏他们的政治平衡。这样，刘文实际上把经济政策的效果与社会的阶级结构联系起来。

第七，刘文还展示了技术革新的辩证作用。刘文指出，农业部门的情况的不同，将导致技术进步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影响。比如，在农民拥有耕地的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将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城市工人工资。而在农村土地地主所有和农民租佃制度下，农业技术进步将使得城市工资下降，因为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将导致其价格下跌。而由于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农民的收入将下降。而资本主义部门的技术进步则会使资本主义部门受益。

以上是刘文结构主义分析的主要方面。正是这些方面使得刘易斯与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一起，成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作为西方学者，深受新古典经济学教育，能够提出与新古典不同的理论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还任重道远。刘易斯他们对新古典的理解也与普通的自己标榜为新古典的人不同。刘文在这方面也有极佳的表现。

第八，刘文指出，在无限劳动供给国家，货币成本（即价格）信号是错误的。对这一点，刘文给了三个例子。

^① 中国长期依靠信贷来管理经济本身就说明了刘文对信贷讨论的重要性。

^②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曾经试图实行 0 通胀政策，结果失败了。其客观方面的原因值得深思。

1) 外国商品的低价格会导致外国产品破坏本地产业，因此，不能简单地依赖价格信号。西方之所以能够依赖价格信号，因为他的工业、商业等能力足够强，外国根本无法与他进行经济上的竞争，因此无需国家干预。而落后国家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抵御力量，又不借助国家之力，那只能是自取死路。从西方福利经济学多元社会福利函数概念（王今朝，2012）的角度看，为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国家干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它对于发达国家的重要性。这一个例子足以表明，那种在一个生产并不发达因而市场也非常脆弱的国家把价格作为指导生产与消费最基础信号的概念是错误的。

2) 如果劳动力免费（即无限供给），而其他资源稀缺，那么，在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时，应该比较的是该国稀缺资源的价格而不是劳动力的价格。这意味着，即使劳动力无限供给，只要资本可以使用，这个国家就会使用资本进行生产来促进出口。刘文还指出，那些热带国家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确实得到了就业和税收，但最大的利益由外国消费者得到了。或许，这个观点预测并同时解释了国际贸易中的库兹涅茨之谜！它恐怕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今天出口规模如此之大，却对于就业拉动的作用极为有限。它也说明，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制定中，用就业和财政收入来论证对外开放合理性是缺乏逻辑合理性的，是片面的。

3) 关于新古典的利润最大化假设的合理性，刘文给出了一个历史主义的解释。在刘文看来，利润最大化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与封建社会追求坟墓、宫殿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方式相比，是更为理性的生产方式。它要求采用生产性的技术，而不是那些停滞的技术，并在这个过程中给人类带来相对于封建生产方式所能带来的更大的效用。这样，刘文就唯物主义地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假设的历史来源。当然，刘文的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假设永远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如果以为利润最大化乃是最大的理性，那就会过犹不及。这意味着建立在价格信号基础上的利润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指标，因为它根本不代表最大的理性！

第九，刘文还加深了我们对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理解。刘文重复了新古典的边际产品等于实际工资的就业均衡理论。按照新古典的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从企业劳动管理的角度看，边际产品理论或许也并不为过。它其实相当于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的条件。实际上，只要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加雇用劳动力就是合适的，就意味着利润的上升，如果把工资以外的净收入都叫作利润的话。在刘文中，工资是外生给定的，不是由供求决定的，因此，在刘文中，边际生产力理论不是一种分配理论，而只是一种管理理论。而且，刘文的观点与这一多元函数方法论观点是相容的：在实践中所计算出的任何一个企业的劳动边际产品反映的是特定情况下劳动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产品的增加。情况改变之后，劳动的边际产品将会变化。因此，把边际产品看成唯一的属于劳动的产物是错误的。这意味着用边际产品来衡量工资是错误的。在逻辑关系上，应该是首先确定工资，然后确定就业。就业的确定是完成工作的技术过程所决定的，不是根据边际产品决定的。

第十，刘文还否定了新古典的资本的同质性假设和自由流动假设。刘文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形成一个经济的“孤岛”。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是很弱的。这确实是一个突出的事实（比如，纽约的资本远远多于伦敦的资本。而且，刘易斯还观察到，即使在竞争性行业里，不同利润率的企业都可以生存，低利润率的企业不会被高利润率的企业消灭，因为高利润率的企业会把利润花在炫耀性消费等方面。在这点上，刘易斯的理论与新古典又不同了。

刘文所表达的对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命题、概念、假设的上述理解加强了它的结构主义色彩。反过来看，一个人如果对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经济学界有所了解，就很容易这样看待问题，即马歇尔的新古典只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非排他性的方式。受过这种新古典训练的许多学者在遇到现实问题时，都能表现出较高的实事求是的能力。实际上，就帕累托、凯恩斯、希克斯等人的研究风格而言，他们都采用了一种随机应变（eclectic）的态度和方法，而非僵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方法，尽管他们的分析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二、刘易斯（1954）之瑕疵

上面所归纳的十点并不能概括刘文所有优点，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十点是差别化于已有的解读的，而且，它们将对本文第三部分提供积极的支撑。至少可以这样说，本文第三部分对刘文的本质性

发展是与刘文的上述十点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将保证，本文确实承继了刘文一些精髓，而不是对它的彻底的脱离。对刘文的发展，则必须建立在刘文问题的分析基础之上。

第一，基础概念使用上的不分畛域

从人类学角度看，社会形态学是较发展经济学更为基础的学科。在发展一种发展理论时，必须明确其所涉及的社会形态。如果混淆不同的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理论必然出现逻辑范畴的不分畛域。刘文正是不分畛域地使用资本主义这一基础概念。它把苏联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进而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混淆起来。它没有看到，利润归国家和全社会所有与利润归私人所有存在重大的理论差别。如果没有这种差别，不仅马克思《资本论》可以取消、公共经济学可以取消，就连国家都可以取消了。而不管私人资本也好，公共财政也好，国家干预也好，都对经济发展与否、过程、结果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且，即使把苏联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还可以说得过去，苏联也没有一个刘易斯在其他国家所观察到的占全国收入 40% 而人数只占全国 10% 的储蓄阶级存在。从这点看，在科学性程度上，刘文是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理论后退了。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上的区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实证主义问题。比如，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主义可以导致经济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现象（见本文第三部分）。又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也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具有根本的差别（比如，失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会出现，即人人享有工作保障）。这表明，刘文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概念的适用确实存在重大瑕疵。由于社会形态学是较发展经济学更为基础的学科，这一瑕疵的存在对于刘文的科学性带有根本性的意味。

第二，外生变量选择上的不分主次

工资变量是刘文逻辑体系的出发点。刘文将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说成是经济发展对劳动工资不产生影响，这本身决定了其后的结论。如既然劳动供给曲线长期是水平的，那随着经济发展，总有一天刘易斯拐点就会出现。可是，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本身需要证明。其实，这无法证明，它只是刘易斯不分主次地选择外生变量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如果选择其他外生变量，则供给曲线本身就不会是水平的。刘文认为工资只受社会习俗（C）和地租（R）有无这两大外生变量影响，从而提出如下函数关系：

$$W = W(C, R) \quad (1.1)$$

刘文把公式(1.1)中的自变量看作是外生的，从而没有考虑它们自身的变化。而实际上，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社会习俗和地租的有无是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自身就代表着制度（IN）的根本变化。从制度经济学来看，制度包括习俗、地租，还包括它们之外的许多变量。这也显示出公式(1.1)的另一个问题，即它的抽象程度不够。它只是考虑了两个具体的制度，而没有上升到抽象的制度，从而没有考虑其他具体制度的可能性。其他具体制度影响工资的显著性如果可能远远超过 C 和 R 影响工资的显著性，那么，公式(1.1)就应该更为抽象，就应该变成：

$$W = W(IN) \quad (1.2)$$

刘文把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统称为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在刘文中，“资本主义”自身作为制度都是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刘易斯本人都无法反对公式(1.2)。刘文注意到，热带地区的人民在 75 年中极大地发展了糖业生产，却依然赤脚走路，住在极其简陋的房子里。他们的工资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没有发生变化。这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要改变这种制度，或者他们想到的，也做过努力了，但没有成功。结果，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以为西方国家贡献更多的糖产品为代价，继续维持与 75 年前一样的生活。但从中不能归纳出经济发展不影响工资的假设。因为这只是使用不完全归纳法所得出的结论，并且非常容易寻找出一个反例。

制度确实是一个影响工资水平的更为显著的变量。制度是可变的，为了使工资提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刘文却忽略了制度变化对于工资的重大影响。不同职务、技术级别的工人得到不同工资正是制度规定使然，并且这些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特定关系。比如，1949-1976 时期的中国所实行的八级

工资制在相当长时间里也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这说明，制度对工资的影响是巨大的。根据这些考虑，公式(1.2)是更为科学的工资决定关系。

刘易斯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大差别导致了刘文在工资决定上的模式识别错误。如果社会主义能够为所有人提供最平等的经济基础，特别是让普通人享受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最高的实际工资，^①刘文就不应忽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许多诺贝尔奖得主都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资本主义所不能实现的平等。如果该命题为真，刘文就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也表明，我们上面分析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

由于工资变量处于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核心，以古典分析方法为工具的刘文在工资决定的模式识别中的错误就必然带来基本观点和推论的错误。刘文在不少孤立的具体问题上表现出辩证思维的能力，而在整体主义地运用辩证思维方面，他的能力是欠缺的。诺贝尔奖颁发给这样的理论，实在说明，诺贝尔奖并不代表真理，甚至连人类探索真理的努力也不能代表。因为在刘易斯这样的人进行理论分析的时候，中国、苏联这样的国家早就在实践人类最前沿的制度了。刘易斯根本不是在探讨经济实践的前沿，而只是在重复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价值判断！这也就说明，刘易斯的理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创新性！

第三，理论体系构建上的不知“魏晋”

刘文的基本模型是关于工资、利润、资本积累与增长之间的变量关系，这些变量关系构成了如下的经济循环过程：1) 工资由外生变量决定，并作为刘文逻辑的起点；2) 给定总资本，工资的高低决定了利润的大小；3) 利润用于投资；4) 新增投资吸收更多劳动力就业；5) 更多就业导致利润进一步增长；然后再从第三步依次类推下去。根据这一经济循环过程，经济的发展就是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就是经济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为了使上述循环成为可能，刘文认为，首要的、核心的条件就是使储蓄率从5%左右上升到12-15%。这个看似颇为合理的推理过程其实蕴藏着许多问题和矛盾。上面两点我们对刘文瑕疵的分析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下面我们则指出它的推理过程的问题和矛盾将导致不虞之后果。

1、命题的逻辑矛盾和命题间的前后不一

每一个命题都会涉及到逻辑性问题。如果在基本命题上出现逻辑错误，整个理论就会坍塌。刘文没有意识到资本获得收益的逻辑合理性问题。在这一重大经济问题上，刘文延续了三位一体公式的观念。它没有如马克思那样提出剥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权的主张，反而主张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建立在资本家得到利润的基础之上。尽管刘文有多方面的优点，但正是这个缺点决定了刘文模式的根本问题。刘易斯没有考虑发展的目的、发展自身的合理性问题，这导致他在寻求发展的机制时陷入到实用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中。如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建国后的60年内不需要谈论发展（实际上是GDP增长）的目的问题，那么，在60年后，GDP本身已经成为可以否定的对象。而这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相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理论是一系列命题所构成，因此，还存在命题间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在刘文中，既然已经把苏联当成国家资本主义，那它应该也清楚，苏联尽管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因此，刘文既然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适用于苏联，那么，就不应该又认为，提高储蓄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资本家阶级身上是一个普适的规律。列宁即使主张过国家资本主义，他也一定反对在一个很长的发展阶段去大力发展一个资本家阶级。中国在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几年中，对资本家也是限制的。吉布斯等指出，储蓄的动员有许多机制，俄国、德国、英国三者有很大的差别，这对于三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三国发展模式上的差异性。而1949-1976时期的中国和1917-1953时期的苏联都没有依靠资本家作为储蓄阶级。他们都是通过国家财政和定价的办法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期望的储蓄率。如果给定中国和苏联的这个经验，刘文的储蓄机制理论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如果把刘文的储蓄机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共性、普适性理论，其后果，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果，也将是恐怖的。中国和苏联的发展模式如果采纳刘文理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不难预测。

按照上面分析，如果刘易斯能够分清“魏晋”，刘文在命题逻辑性以及命题间的一致性上就可能避

^① 这种平等当然可以用实际工资来衡量。社会主义的高实际工资不仅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低价格，而且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全面的公共产品。

免出现问题。刘文的不知“魏晋”还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发生。

2、对实践的熟视无睹

首先，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12-15%的储蓄率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当英国产业革命发生时，储蓄率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刘文的这一说法只能理解为，12-15%的储蓄率是现代社会中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的科学技术的采用需要对大量不可分的资本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只有在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上升到一定水平才行。刘文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储蓄率最高是15%。实际上，中国1950年后的储蓄率达到了20%以上。这种可能刘文没有考虑到。^①这说明，极为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刘易斯并没有把他的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一致起来。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讲，这种不一致是极为重要的。你不能简单地忽视它，而必须认真地对待它。其实，一旦地认真对待起来，刘文理论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刘文显然没有考虑中国如何做到更高的储蓄率，然而，这点被中国人做到了）。

其次，刘文仅仅根据资本家投资行为相对地主消费行为的合理性，就认为资本家是储蓄阶级，就得出储蓄率的上升是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它写道：“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收入分配被改变得有利于储蓄阶级”（第32段）。在分析储蓄来源时，刘文再一次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它认为，工人储蓄和中产阶级储蓄都很少。前者没有收入，后者的收入本来可以用于储蓄的部分用于了旅游、住房、教育孩子、养老、保险等与邻居攀比的事业上。因而，如果对储蓄感兴趣，就必须集中注意利润和租金。利润是否分配不重要。如果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增加，那么一定是利润占国民收入份额增加。于是，问题变为，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怎样才能增加？答案很简单，由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以及资本主义部门的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占GDP的比例一定会增加，除非工人就业的增长超出了剩余的增长。整个资本主义部门占GDP的比例也会增加。刘易斯模型认为，只要工人工资固定，利润被用于再投资于生产性资本，这种二元经济的利润占GDP的比重就会不断上升，直到拐点出现。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刘文既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它在其他问题的叙述上的辩证性也就失去了意义。刘文指出，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必须是偏向于资本主义利润而不是租金的不平等才能产生经济增长。刘文还指出，只要一个资本主义的部门出现了，它的变大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刘文还指出，一国穷不是因为一国穷，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部门小。然而，既然它肯定了一个储蓄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一个剥削阶级存在的合理性。这在微观经济领域，没有什么合理性；在宏观经济理论，也没有什么合理性。刘文的整个分析旨在主张发展一个资本主义部门，可是，它为什么不主张平等地发展整个社会呢？就中国1949-1976年的发展路线和发展结果而言，显然与刘文是对立的，而且恰恰是平等与效率实现了统一。而且，显然，与刘文对立的平等与效率有机统一的更加优化的发展路线和发展结果并不只有一条。

第三，刘文的分析还为错误的个别发展政策留下了空间。1) 刘易斯虽然清楚通货膨胀的危害，但刘文又认为，即使是最可怕的超级通货膨胀都会留下巨额的资本积累（如1919年后的德国）。这里，或多或少地，刘易斯实际上表达了一种通货膨胀崇拜。这是非常糟糕的。战后的德国估计从来没有想过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积累资本。中国四大家族依靠通货膨胀积累了巨额的资本，可结果怎样呢？2) 刘文认为，为了增长，应该发展那些收益快的企业（轻工业）。这当然又是比较糟糕的结论。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失误，恐怕就在于过分地发展了轻工业，而忽视了装备制造业等重工业的发展。这本身又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刘文无法看到重工业优先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益处是它把资本和技术抽象地统一起来的必然结果。这又进一步显示，刘文没有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储蓄率提高、重工业发展、社会平等、经济周期、重大挫折等）。^②

第四，刘文在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后，就没有必要考察经济发展所涉及的积累过程、投资过

^①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而实践又具有讲究最大化的特征。中国以20%的储蓄率所能实现的经济发展无疑优于15%的储蓄率所能实现的。刘文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那就说明它缺乏科学性。

^② 刘易斯在三个对加勒比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发展的建议中，隆重地推荐引进跨国公司。见 <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G2-3045301343.html>。

程和分配过程和其他过程（如消费）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它的分析缺乏了辩证性，从而实际上主张，只要经济按照它的方式来发展，就不会出现问题，直到刘易斯拐点出现。它认为，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经济发展一旦开始，就不会出现问题（参见第 28 段对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对话”的分析）。它的分析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只会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才会出现的观点相一致（但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经济周期）。它也忽视了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待刘易斯拐点出现后，是否还能持续的问题，以及是否还能保持原来的社会形态的问题。

第五，有人指出，刘文只考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利益，没有通盘考虑农民的长期和短期最大利益，也没有考虑农业部门对于经济发展的其他贡献。关于这一问题，不仅有理论的回答，比如，张培刚（1945）已经非常明确，农业部门发展对于工业化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且有实践的回答。比如，1949-1976 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组织领域出现了巨大发展。无疑，任何实践的回答都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支持。这说明，至少在许多方面，有许多人相比刘文已经领先一步了。

第六，刘文尽管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发生的四个条件，并把第二个条件（即城市部门的发展导致工农业产品的贸易条件发生了不利于城市的变动，迫使资本家增加支付给工人的产品比例，以保持他们的实际工资不变）作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然而，刘易斯没有分析这些条件自身出现的条件。而这又是与发展关系极大的。实际上，系统地考察这些条件，就会得出一个与刘易斯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这正是下面要做的事情。

四、拐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不存在性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变性与刘易斯（1954）的本质性发展^①

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蕴含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TL*）。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假如刘易斯拐点存在，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这种类型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刘文所谓无限劳动供给不过是廉价的劳动力而已。从人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看，刘文的这个观点是一种自私、冷酷的宿命论哲学。它已经预测了劳动者的长期的贫穷。刘易斯也希望劳动者的状态变好，可是，他把状态变好的责任推到了经济的自发性发展上，也推到了遥遥无期的未来。他举了热带人民 75 年来生活都没有变化的例子。而今天不是中国有学者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吗？从新中国成立到所谓刘易斯拐点，也要了 60 年的时间。可是，经济发展真的必须是这样吗？我们认为，不是的。下面的对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的决定因素分析将会展现这一点。

1、命题一：廉价劳动力规模（*SL*）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由于同一单位的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力就业是有限的，而且如果没有大推进的计划，投资很难增长，所以，这个命题确实成立。这个命题蕴含着越是人口小国，越容易发展。这大概能够帮助说明东南亚四小龙的成功。这四小龙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然而，并不是说小国一定能够成功，因为还有许多小国没有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这一命题也说明，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是比较漫长的。然而，这一命题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没有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前一定要完全靠廉价劳动力。实际上，中国在人均 GDP 达到某种水平时，完全可以全面提升劳动力工资。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是可变的。

2、命题二：地区发展的资本、技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性（*UE*）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具有回波效应，即由于它的经济发展，吸引了落后地区的资本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从而使得发达地区的资本、熟练劳动力数量远远高于不发达地区，这进而产生了发达地区技术进步更快的激励。回波效应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

3、命题三：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外溢性效应大小取决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AG*）。这个差距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

4、命题四：发达地区劳动力在全国劳动力所占比例成分越小（*LP*），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① 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以及下面的十个命题是龙斧博士在 2012 年 4 月 23 日参加在山西大学召开的政治经济学论坛第 14 届年会时提出来的。参见龙斧、王今朝：《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合理性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性质与问题》，政治经济学论坛第 14 届年会，2012 年。

5、命题五：粗放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结构中，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劳动力收入增长率差距（ GG ）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6、命题六：企业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收入增长率差距（ FG ）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7、命题七：原来属于社会公益福利的领域商业化、利润化、私有化、市场化程度（ FZ ）越高，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8、命题八：价格指数和工资指数比率（ RW ）越高，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9、命题九：在被资本主义国家敌对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RE ）越紧密，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

10、命题十：在实践上，如果一国政府采取加重上述八种因素的政策（ PO ），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

于是，我们有以下公式：

$$TL^j = TL^j(SL^j, UE^j, AG^j, LP^j, GG^j, FG^j, FZ^j, RW^j, RE^j, PO^j) \quad (1.3)$$

而且，我们有 $TL_i^j > 0$ ， $i = \{1, \dots, 10\}$ 。上标 j 表示国家。

如果不同国家在上述八个自变量上存在差异，在时间差函数上也存在差异，那么，可以推定，我们一般会有 $TL^j \neq TL^k$ ，即第 j 个国家和第 k 个国家的劳动成本发生变化的时间差一般不会相同。从历史反证法的原理看，如果中国采取另外一种改革开放的模式，它的劳动成本发生变化的时间差可能就会比实际要短，而且可能出现戏剧性的结果。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的可变性，特别是它戏剧化变化的可能性，说明了刘易斯理论的根本缺陷。下面我们用改造的刘文所使用的图形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不存在刘易斯拐点。这将更清楚地说明刘文所存在的问题。

上述公式和推论可以用图 1 来细致地加以分析。在图 1 中，横轴表示一个国家劳动力的秉赋，纵轴表示工资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PL^i 表示给定资本总量条件下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J. Robinson 所提出的资本是否能够加总的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其中， $i=1, \dots, n$ 。随着 i 的增加，这个国家的资本总量也会增加，这会引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为了简单，图 1 中我们假设劳动边际生产率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减少。图 1 是在 Lewis（1954）图 2 基础上给出的，然而，相较于后者，图 1 有了本质性改进。

首先，图 1 展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多重可能性。其中，最坏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 L^5 。并且 L^5 只有在资本存量对应 $i=5$ 的情况下出现。很显然，上述十种因素的某种组合会共同导致这种结果的出现。可是， L^4 、 L^3 、 L^2 、 L^1 分别代表了更小的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我们上面提出的十种因素针对的是中国的情况，其他国家与中国在这十个方面具有的差别，就会引起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上的差别。而特别是第十个因素，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存在的因素，也可能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因素。无疑，第十个因素反映了一个政府的主观能动性的高低，它越向相反方向发展，就表明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越高。而这意味着其发展就越有特色，越不是刘文意义上的发展。

其次，图 1 还展示了刘易斯拐点不存在的情况。这正是政府具有最高主观能动性的情形。如果 W 表示经济发展之初的城市工资水平，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调整工资水平，使得所有人享受到差别不大的更高的工资 W' ，使所有人平等的享有工作保障，那么，自由劳动力市场下的刘易斯拐点就永远不需要出现，出现的只是国家对工资的调整。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它必须否定资本所有者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收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

刘文不十分同意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是剥削、抢劫的观点。刘文认为，这种剩余（部分被消费、部分被用于资本形成）中，消费部分中，部分是由于管理和创新性服务的报酬和公务员的报酬。尽管它也指出，这个部分的大小是否适当显然是可以争论的。它注意到，苏联支付了公务员太高的工资（刘文认为，从伦理上说，这部分剩余属于工人），同时，它也注意到，社会主义的苏联用于资本形成的部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了。也就是说，国有化剥夺了资本家对这部分剩余的控制权和在后面某个时间对这部分消

费权，但并没有把这部分转移给工人。这里，刘易斯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苏联的经济当时无法转移给工人。因为 50 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许多建设有待进行。冷战又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生存的。这表明，刘易斯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连西方的公共经济学或财政学的基本原理都没有顾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生活在和平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想象，在图 1 中，根本不会出现任何正斜率的劳动供给曲线。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之日起，就是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并且一直持续下去。但它的位置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上下调整。通过这种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就能科学地处理政府、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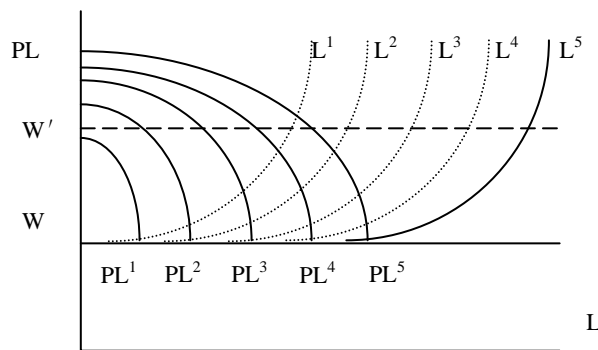


图 1: 二元经济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

业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根本不需要像刘文理论那样发展经济。在这样的经济里，不会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周期，即使存在，也不会出现失业。考虑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完全达到满足社会所有人的生活要求的水平，却由于分配的不均导致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尽管社会主义实行起来还会遇到种种困难，它也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一种社会形态，更好的一种发展战略。这又证明，刘文的性质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它把苏联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范畴，1917-1953 年苏联的经济发展也不能用它来解释。

五、总结和展望

本文详细解析了刘易斯（1954）的瑾瑜与瑕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刘文的理论概念要素和命题要素本质性地发展了刘文的理论。这种发展甚至是对刘文基本理论观点的否定。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本文对刘文的解读或许能够供读者了解怎样阅读一篇论文，怎样客观地科学地对待西方的理论，而本文对刘文理论的本质性发展或许能够给读者提供一种启发，即怎样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并根据这一研究视角构建新的理论，哪怕借助已有文献的概念和命题。然而，阅读本文和进行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理论构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抛开对社会主义的成见，否则，学术的根本性进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土地上。

参考文献：

- [1] 莱斯特·C·瑟罗. 李迈宇译. 得失相等的社会——分配和经济变动的可能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207.
- [2] 王今朝、龙斧.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理论与政策[M]. 科学出版社, 2011.
- [3] 王今朝、龙斧. 经济学方法论中演绎与归纳之争的终结[J]. 国外社会科学, 2012, (1).
- [4] 王今朝.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实证研究[J]. 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12.
- [5] Dixit, A.K. Models of Dual Economies[A], in J. A. Mirrless and N. H. Stern, eds.,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C]. N.Y.: Wiley & Sons, 1973: 325-352.
- [6] Ranis, G. Arthur. Lewis'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y[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4, 72, (6): 712-723.
- [7] Hahnel, R. Economic Justice and Democracy: From Competition to Cooperation[M]. 2005, Publisher: Routledge.
- [8] King, J. E. A History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M]. Publisher Edward Elgar, 2002.
- [9] Lewis, W.A.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39-191.
- [10] Luzio, E. The microcomputer industry in Brazil: the case of a protected high-technology industry[M].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ublishing, 1996.

A Differentiated Decipherment and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of Lewis's Dual Economy Theory

Jin-chao Wang

(Wuha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deciphers the nature of Lewis's Dual Economy Theory, from which the reasons why it is not the right theory with which to analyz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 are indicated. Secondly, this paper modifies the Lewis model with the gen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s a theoretical proof why Lewis model cannot be applied to China's economy. Whereas a general problem is put forward, to refer a foreign economic problem is not so easy to say as China's scholars usually think of.

Key words: Development Approach; Dual Economy; Lewis's Turning Point; Marxism